◆观 点

领导干部如何勇于担当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时期，问题的产生速度超出了制度的调整频率，因此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除了要依靠完善制度，明确职责，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各级官员有所担当。实际上，在许多突发事件中，勇于担当常常是第一时间控制事件扩散及影响扩大的首要因素。人的能动性与制度的规范性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明确职责就是确定职权，划分责任，以实现制度内部分工与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有效对接。这是提高制度绩效的基础性工作。从世界范围看，所谓的制度成熟国家，就是建立起一套与经济社会分工的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内部分工，为各种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设计了相应的治理主体和机制，实现最大限度的制度对问题的全覆盖。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官僚主义是主要弊端，根源之一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明确政府职责及其政府内部的职责划分，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历次政府机构调整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尽管在改革过程中成立了新的职能部门，进行了更细致的职责划分，但依然出现了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代表的“九龙治水”乱局，有分责，缺乏共责，有事后追责，缺乏事前担责，使得一些本来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问题放大、发酵，最后成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问题。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至今随处可见。

显然，解决责任问题不能只依靠建章立制，何况现在相当数量的制度规定都流于形式，只强调制度上墙，不重视制度成习，甚至许多制度是由责任主体制定的，存在着问题上自我免责、利益上自我强化的倾向。因此，在继续完善制度规定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还应把重点放在责任主体，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强化和尽责习惯的养成上。

这种责任意识和尽责习惯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担当精神。有人统计，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讲话中，有近40次使用“担当”一词，评价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在当下，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担当首先意味着能从大局出发，面对各种问题，勇于挺身而出，积极应对，主动承担，而不是将原因简单地推给前任，将难题留给后任，交给下属，面对困难敷衍塞责。这样做也许能求得辖区内一时的“稳定祥和”，个人的安全进退，但更可能将小问题拖大，使潜在问题凸显，诱发更大的“蝴蝶效应”。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和激情，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坚守。不能一方面在大肆放纵个人的私欲，另一方面又在批评制度的漏洞；一方面在批判国外制度的腐朽，敌对势力的企图，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家人和财产转移出去；一方面在抱怨上级组织对自己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又在下属中搬弄是非。这种分裂的“官格”，不断降低着一些领导干部的责任底线，拉低社会对于领导干部的道德期待。

现在干部选拔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说明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得到了优先考虑。但是，对于干部品德的理解，不能将尽责简单化为服从，将履职等同于唯上。那样会进一步强化制度性的“官格”分裂。要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人格，才会有充满正气的“官格”。要让每个官员在制度的监督和社会的注视下，形成强大的自尊，然后才会真正热爱和献身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2014年第7期《决策》杨雪冬）

从网络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20余年来，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社会”的崛起，已然深深影响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问政的兴起、微博反腐的蔓延，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中国反腐的“春天”。但从长远而言，制度才是反腐的最终归宿。

从网络反腐走向制度反腐，核心内容就在于坚持制度反腐为主，网络反腐为辅，将后者纳入前者的宏观框架，最终实现两者的“无缝对接”。相较于网络反腐，制度反腐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具体管理条例来控制腐败”。就其属性而言，在静态层面要求一个完善的、密切关联的制度体系；在动态层面则要严格执行与落实相关制度、规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制度内容而言，既需要一系列规范主体行为的法规、规章、政策等，也需要建构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体制机制。因此，作为一种混合型反腐设计，制度反腐要求作出观念、制度、体制与执行方面的改变。

第一，要实现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向法治思维的转变，要求行为主体具有法律意识、养成法治逻辑、形成依法办事的行为模式，即将诉诸法律当成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具体到反腐倡廉就是倡导制度防腐，通过体制内渠道提供腐败线索、举报腐败问题、监督权力运用。通过充分利用宣传教育的形式，强化公民的法律认知，养成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

第二，要完善反腐败体制。反腐不仅是一项事后应急工程，也是一项事前预防工程，且后者才是反腐败的关键。从体制层面出发，要加快大部制改革，整合权力同质机构、部门，厘清权力边界，防止权力交叉、打架，办事相互推诿、“踢皮球”，积极清理“三不管”地带。要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民法院、检察院等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审判独立为契机和切入点推进司法独立，并在现有司法垂直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法院、检察院、纪检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独立运行。

第三，要建立健全与网络反腐相关的制度规范。针对1989—2006年的跨期研究表明，法制建设、财政分权等是导致近年来腐败下降的主要因素，其中法制建设使腐败程度下降了26.17%。法制建设之于反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认为，赋予网络反腐以合法“身份”，既要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反腐的宏观架构，如将网络举报、网络曝光、网络反腐等当作反腐败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将网络曝光、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等看作权力监督与限制的创新选择；也要在网络反腐的语境下加快有关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制定，从法律的高度奠定网络反腐的合法地位，肯定网络反腐的正当性。同时，加强与“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侵权、打击报复、举报人权益保障等相关的法律、规范、制度建设，为网络反腐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持，增强网络反腐的权威和效能。只有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网络反腐固定下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该方式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严格执行与落实反腐倡廉的相关制度规范。习近平强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除凸显良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建构之外，更倾向于对这些制度、规范的落实与执行。尤其就当代中国而言，并不缺少反腐的法律法规制度，缺少的是反腐制度落实层面的制约监督机制。这就需要培养一支素质过硬、品行兼优、有责任心、忠诚度高、正义感强的政策法律执行队伍，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然、违法必究”；需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拒绝与抵制特权，不论监督对象官职高低、权限大小；还要加强对相关制度、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扩大影响力、覆盖面和权威性，夯实制度执行的群众基础，培育制度执行的文化氛围。（2014年第8期《行政管理改革》陈潭 刘建义）

◆纵 横

美“亚洲再平衡”矢志不移

历史上，美国外交战略总在“扩张”和“收缩”之间摇摆。近期，针对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批评不绝于耳，主要是指责奥巴马一味“收缩”，放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无论在对俄关系还是美中关系上，不仅一事无成，还在走回头路。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今年再版，增加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一节，字里行间，“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无处不在。读过此书的人一定明白，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思想基础来自何方。

从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看世界，无序状态是常态。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各国争夺地区霸权也就成了常态。新兴大国因力量变强具有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冲动，大国之间因为争夺霸权发生冲突和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就是米氏理论的核心。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理论显然已经脱离现实，需要改变，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作重大调整。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有很大市场，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大家看到，美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2011年公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这不仅造成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还打破了地区战略均衡。因为，美国的插手加剧了中国与部分邻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

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将主要军事资源调集到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上增强与盟友的联系，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地缘政治上借助日、越、菲等国给中国制造战略麻烦。美国已打破多年来坚持的相对中立的“战略模糊”，选边站队，提出“拉偏架”的所谓“南海冻结现状”方案，在海洋权益的争端中支持这些国家。

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和重心转移还将继续，步子还将加快。中美确实存在不同战略取向，地缘政治上也有分歧和不同看法，然而，中美建交35年的历史证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赖，已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合作伙伴。两国如何相处，是合作还是对抗，不仅对两国人民，而且对地区和平与繁荣以及应对全球挑战，都至关重要。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1世纪，作为上升大国的中国和守成霸主的美国应如何相处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是对两国的严峻考验。为此，习近平主席2013年倡议，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表示，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发展。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既着眼于双边关系、更具全球视野的战略构想。相信两国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在新世纪携手走出一条大国和平相处之道。（2014年第673期《中国新闻周刊》何亚非）

◆史海钩沉

两税法：大唐由盛转衰的节点

唐德宗即位后不足3个月，就破格提拔出身名门世家的杨炎为宰相。当时皇上为防止“安史之乱”重演正准备削藩战争，为了筹集更多的铜钱，杨炎一上任即奏请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

其实，两税法的许多内容，譬如夏秋两税、根据贫富征钱、按照土地亩数计税等，在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时就已开始实施。杨炎所拟两税法，是在唐代宗税法改制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改革。其主要突破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二是将“量入为出”改为“量出以制入”。

过去朝廷征税，只按人丁收粮绢为税，税额长期保持不变。唐初期实行均田制，每个人丁耕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所以按照人丁征收一定数额的粮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百姓种田织布，将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缴纳给官府，不需要采用钱币进行折算。杨炎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要求百姓缴纳铜钱，当年便将百姓手中的铜钱几乎洗劫一空。为了下一年度缴税，唐王朝统治下的百姓都需要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提前出售，以换取纳税所需要的铜钱，结果造成产品价格迅速下跌。

杨炎很会忽悠，一边高呼减轻百姓负担，取消按人丁征收粮绢的定额，一边又要按照朝廷开支需要向百姓征税。唐代的经济鼎盛时期在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当时朝廷每年税收铜钱不过二十亿文，而实行两税法的当年，朝廷就从民间征收铜钱三百亿文，相当于天宝年间每年朝廷税收铜钱数量的15倍。

此外，天宝年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约为九百万户，经过安史之乱，建中元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下降至三百万户。折算下来，实行两税法时，平均每户缴纳铜钱的数量达到天宝年间平均每户缴纳铜钱数量的45倍。45倍的税赋负担加在百姓身上，且全部征收铜钱，钱荒从此产生。

钱荒导致朝廷连军饷也发不出来。领不到军饷的军队开始哗变，京师长安被哗变的军人占领，唐德宗率群臣逃到咸阳。哗变的军人拥立朱泚在长安做了大秦皇帝，唐德宗再逃至汉中。后来，唐德宗不得不布告天下，承认错误，赦免叛乱，表扬勤王的军队，终于止住了逃跑的脚步。

钱荒造成大唐商品经济衰退。钱荒的出现还不止军事上的失利，更严重的是给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民间无钱，物价自然暴跌。百姓出售产品，却无人有钱来买，致使农商破产，百姓生活潦倒不堪。不仅如此，由于百姓手中无钱，商品交换只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这是货币经济的严重倒退，是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的严重打击。唐德宗之后，继任几代皇帝虽多次下诏钱帛兼用，绫、罗、绢、布、粟均为法定货币，但皆未能挽救商品经济的衰退。从唐德宗的军队哗变开始，大唐王朝慢慢失去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大唐帝国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钱荒还使社会财富流向特殊利益阶层，地方官吏借朝廷之名逼迫百姓以钱纳税，社会豪强趁机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相反，百姓手头无钱，朝廷只好再次改收粮绢为税，但由于物价暴跌，百姓缴纳粮绢的数量比两税法之前增加了数倍。于是，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历了两税法导致钱荒爆发的过程，曾赋诗诉说两税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说明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时，白居易诗中说：“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至于两税法存在的问题，诗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关于百姓承受的苦难，诗中说：“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恶得无饥寒？”

两税法“以钱计税”，确实是我国古代税收制度上的一个创举。如果它没有立即导致钱荒的爆发，没有导致大唐商品经济走向衰败，它就是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税收制度。但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正常的商品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发展，货币经济也绝对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两税法实施之后，大唐商品经济衰退便成为注定的结局。（2014年8月上《当代金融家》石俊志）

◆评 论

反腐促国家治理变革

十八大确立反腐基调后，六百余日，从打“苍蝇”到打“老虎”，从对政府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生活进行“四风”之整顿，到定向打扫重点领域，定点清除贪腐分子及其背后利益群体，这一轮反腐风暴，历时之长、影响之广，为改革开放以来仅见。而公众民意亦从首肯其意愿精神但观望其行动，一步步走向深切认同并拥护拥戴。

反腐与改革是硬币之两面。反腐为改革清障。今天反腐，就是打破利益禁锢，理顺市场经济模式。

在过去的六百余天里，本届中央领导集体视反腐为首要任务，以实际行动明确表示反腐无禁区、表现出刮骨疗伤的决断力。反腐节奏越来越快、所打老虎规格越来越高，反腐风暴前所未见。

反腐证明执政党自我革新的行动力，反腐更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在明确贪腐不是经济发展润滑剂之后，反腐与经济改革息息相关。理顺经济结构、推动混合所有制、政府让渡市场空间以释放红利等问题，在肃贪大背景下，料改革阻力变小，改革举措得以顺利推行。

反腐本身就是改革一部分，反腐进行与相关制度改革、建设合而为一。比如，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本身就是反腐制度的重要部分。而重新划定市场与政府关系、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也在消除滋生腐败的灰色地带。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十八大以来力推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在反腐中加速进行。

法治作为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也成为工作重点。反腐呈现制度化、透明化之特性。中纪委的一些制度化举措，重要案件审理时新媒体直播，中纪委巡视组全覆盖、通过媒体和官方网站及时披露信息，派员与公众交流等，都已经表达出制度反腐、透明反腐、法治反腐之气象。

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础上，现在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方向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清晰。而即将在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十八大以来，致力于寻求一种有效的现代化同时立足中国实际情况的现代治理模式。而依法治腐，则应该是这种现代治理模式的核心部分。在未来的治理体系里，有党纪，有国法，有新媒体条件下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支持，有民间自我管理，一旦治理体系建设完成，以法治之基撑华厦，长治久安可期。

反腐促改革。以反腐为重要抓手的改革清障工作获重大突破。如此难啃的硬骨头都可啃下，对执政党领导的决心和能力已不必质疑。在不断为改革清障，在聚拢民心、获得权威之后，下一步，可以快速推进那些该动而未动的各项改革措施，快速培育新而健康的市场经济形态、新而健康的市场主体、健康的政商关系以及正当利益群体，以及加速建设现代治理体系。这些方方面面有序展开的改革，最终将用新生健康组织肌体快速发育，取代坏死腐败的部分组织肌体，实现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之梦。（2014年8月1日—7日《时代周报》社论）

◆文 坛

如果让我选择

钱穆曾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朝历史素来极受中外历史学家的关注，从日本的内藤湖南到法国的谢和耐，特别是宋朝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进步，都得到了全世界学者的赞赏和肯定。“四大发明”几乎成为宋代中国的最响亮名片，马克思称赞说“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更是毫不讳言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虽然西方思想界常常将中国文明视为西方现代的一个起点，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却认定所谓现代文明完全是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西学”），与古代中国不仅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反义词。这种吊诡的事实说明，人们对历史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差。

数年前，吴钩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沉迷与探勘，《隐权力》这本13万字的小书也算其厚积薄发之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利用古今中外的正史野稗和前人笔记，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细致地爬梳了宋朝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从而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宋朝。

吴钩在书中，常常采用现代名词来与历史案例相对照，这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相关性更加真切，特别是对一本解释现代（近代）性历史的书来说。比如，开放皇家园林为“免费”的“公园”，举行捶丸（类似高尔夫）、蹴鞠（类似足球）和相扑等“体育活动”，其他如“福利”“临刑关怀”“合法权益”“程序”“产权”“NGO”“CEO”“凯恩斯政策”等等，甚至还有“城管”“强拆”和“公款吃喝”之类。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历史中的宋朝，也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

从这里说，文明没有时间的差别，也没有地域的不同，文明作为人类的共性，同样适用于中国人，甚至是中国人的创造。历史是最好的启蒙，从历史中发现人的尊严，甚至发现一个藏在《清明上河图》里的“和谐社会”，这可能是这本书最让人惊喜的地方。

正如作者所说，对历史“不能预设立场”，更不能想当然。作为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帝国，宋朝仍然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已经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巅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进步是文明的最大标志。遗憾的是，这种现代文明最终毁灭于一场游牧民族的全球征服运动，不仅“崖山之后无中国”，整个人类文明也一度跌落低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镜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不仅是汤因比和马可·波罗他们的梦想，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毫无疑问，宋朝中国几乎将一个中国人最多的梦想变成现实；或者说，它以其文明与理想实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梦。（2014年第25期《南都周刊》杜君立）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